

中国近代史丛书

辛亥革命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2 037 1549 9

中国近代史丛书

辛亥革命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
65.11.15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

辛 亥 革 命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25 字数 60,000

1972年9月第1版 1972年1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300,001—800,000

书号: 11·1·212 定价: 0.17元

毛主席语录

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。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，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。

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，五十年来，有它胜利的地方，也有它失败的地方。你们看，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，这不是胜利了吗？说它失败，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，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。

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，即使在革命时，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，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，因此，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，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。这样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，两大基本任务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。

编写说明

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，我们编写这套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，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，以供阅读参考。

这套丛书，包括重大历史事件，如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革命等，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，陆续出书。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。

我们这个编写组，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。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，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，甚至可能存在错误，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
目 录

一、革命前的中国社会·····	1
二、孙中山与兴中会·····	6
三、继起的革命团体·····	12
四、同盟会的成立·····	19
五、和改良派作斗争·····	27
六、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·····	34
七、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·····	41
八、清朝政府的假立宪·····	47
九、铁路风潮·····	54
十、武昌起义·····	61
十一、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的崛起·····	69
十二、各地反动势力的篡权活动·····	75
十三、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·····	82
十四、辛亥革命的失败·····	90

一、革命前的中国社会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。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抢夺殖民地，发动了一连串侵略战争，它们之间也不断发生狗咬狗的战争。

遭受侵略和压迫的人民无法生活，纷纷起来反抗，革命的烽火遍布五洲四海。在这风云激荡的世界潮流中，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也进入了急剧动荡的时期，短短十几年内，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：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，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，以及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。所有这些，反映了一个事实：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激化。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，敲骨吸髓，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；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不甘屈服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大规模的反抗运动。在这场生死大搏斗中，反动的清朝政府日益暴露出它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。

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后，以西太后为头子的清朝卖国集团曾经公开声明，他们要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。这就是说，为了讨好帝国主义，他们愿意彻底

出卖祖国,出卖人民。在清朝政府的大拍卖下,辛亥革命前,沙俄帝国主义早已侵占了比三个法国面积还要大的中国领土,其它帝国主义继续霸占着中国的香港、台湾、澎湖列岛等地,并且强行租借了中国的澳门、九龙、胶州湾、旅顺、大连、威海卫、广州湾,使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害。它们还从中国沿海到内地,开辟了八十二个商埠,在十六个城市设立了“租界”,和各地的地主、买办、商业高利贷资本相结合,在中国大地上密布层层罗网,搜括中国人民。它们在中国的投资已达二十多亿银元,相当于民族资本的十几倍,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、交通运输业和商品市场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以上,又通过不平等条约、贷款、赔款,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内地税收,在财政经济上扼住中国的咽喉。它们的炮舰可以在中国的领海以及内河、湖泊到处乱闯,它们的侵略军队可以驻扎在中国的大中城市、军事要地,甚至当时的首都北京,使中国的独立徒具形式。它们设立在北京的“使馆区”,也俨然成了一个太上政府,而腐朽的清朝政府却甘心充当“儿皇帝”。所以,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清朝政府叫做“洋人的朝廷”,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工具。

清朝政府对外加紧卖国,对内加紧搜括人民。一九〇一年他们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《辛丑条约》后,对人民的搜括更加残酷。清朝政府本来每年的收入是纹银八千万两,一九〇三年增加到一亿两,一九〇八年又增加到两亿三千万两,一九一〇年再增加到三亿两,十年之间,使人民的负担增加了三、四倍。为了搜括更多的钱财,他们挖空心思,巧立

名目,增加许多新的捐税,也给各级地方官吏造成许多贪污中饱的机会。贪官污吏层层加码,有的地方甚至使征收数额高出清朝政府规定数字的十多倍。这些苛捐杂税不仅逼得广大劳动人民家破人亡,流离失所,也侵害了一部分中小地主的利益,使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。它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,很快达到白热化的程度。

清朝政府不断出卖国家主权,又把搜括来的钱财,大部分用赔款和偿还外债本息的形式缴给帝国主义侵略者,所以人民群众和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,实际上就成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、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:“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。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,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。”^①

在清朝政府严酷的压榨下,受苦最深的是劳动人民,因而首先起来反抗的也是他们。一九〇一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战争硝烟未散,很多地方的人民又拿起武器投入反抗清朝政府的战斗。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〇年间,自发的反清人民斗争发生了近千次,遍及全国各地,直接卷入战斗的群众不下数千万人。随着清朝政府对于人民群众压迫的加深,斗争的次数和规模也逐年扩大。据统计:一九〇五年的群众斗争有八十多次,一九〇九年便达到一百三十多次,一九一〇年陡增到二百八十多次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辛亥革命前夕,清朝政府倒行逆施,早已挖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。所以,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,把它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大

^① 《唯心历史观的破产》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,第一四〇二页。

厦,不论什么人想来支撑,也是支撑不了的。

人民群众的斗争,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。然而,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,它不愿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。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:“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,即使在革命时,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,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,因此,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,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。这样,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,两大基本任务,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。”^①

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,也就是它的动摇妥协性,是从它娘肚子里带来的,是由它的经济地位决定的。辛亥革命前,民族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,力量也很薄弱。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算起,到辛亥革命前四十年中,民族资本先后开办的近代工厂只有五百家左右,投资约一亿四、五千万银元。这样微弱的资本,不但远远敌不过帝国主义在华的投资,甚至与当时带有封建性的典当、钱庄资本相比较,也不到一半。在这种情况下,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无力抵制外国资本,而且相反,他们所需的机械设备、技术资料等,都必须仰赖于帝国主义国家,不少民族企业,甚至不惜招引一部分外资,用“中外合办”的招牌,求得庇护和发展。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很多民族资本家本来就出身于地主、官僚,在农村中占有大量土地,继续保持封建地租剥削;有

^① 《新民主主义论》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,第六三四页。

的人则以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地位，从清朝政府获得一部分专利权，因而很快爬上大资产阶级的地位。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存在难分难解的关系。

当然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，他们和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之间，也存在严重矛盾。民族资产阶级要发财，要发展，首先碰到的就是外国商品的竞争和外国资本的打击。卖国的清朝政府，对于外国商品在国内各地泛滥提供种种方便，而对于民族工业的产品则征收重税，对于民族工业本身又加以种种束缚和限制，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在竞争中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。因此，民族资产阶级要想发展，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，而卖国的清朝政府，又必然成为它首先攻击的目标。民族资产阶级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，也是由中国近代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。

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，也有妥协性的一面，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上，就有联合工农反对敌人的一面，也有联合敌人反对工农的一面。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，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，反映得相当明显。他们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，而最后又终究不免于失败，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就是一个关键。

二、孙中山与兴中会

毛主席说：“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正规地说起来，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”。^①孙中山开始革命，又以其创设革命团体兴中会为标志。

孙中山原来的名字叫孙文，字逸仙，一八六六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（今中山县）的翠亨村。后来他从事革命活动，化名中山樵，所以人们都叫他孙中山。

孙中山有个哥哥名叫孙眉，是檀香山（在北太平洋的中心、夏威夷群岛的中部）的华侨资本家。孙中山在十三岁时到檀香山，随他哥哥生活，先后进英、美帝国主义分子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。一八八三年回到国内，在广州和香港两处地方上学，一八九二年毕业于香港的西医书院。

从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九二年，孙中山所受教育，全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，而且很长一段时间，又是在教会学校渡过的。这十四年中，他学到了不少自然科学知识，也接触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，对于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，起了重大作用。

^① 《青年运动的方向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，第五二七页。

早在檀香山读书期间，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，曾经大大地鼓舞了孙中山。一八八四年他再次去檀香山，美国正在采用各种卑鄙手段吞并夏威夷群岛。夏威夷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英勇斗争，再次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不久，他回到祖国，正好碰上卖国贼李鸿章和法国侵略者签订卖国和约，受到很深的刺激。中法战争，是中、越两国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侵略越南和中国而进行的正义战争。这次战争中，各地人民主动参加战斗，使法国侵略者处处受到打击。在这民族意识新高涨、抗法战争非常有利的条件下，为什么会取得丧权辱国的结果呢？经过分析，他认为完全是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它媚外卖国政策造成的。因此，他对清朝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。

一八九二年孙中山由西医书院毕业后，在澳门和广州两地行医，日益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，在行医中酝酿反清政治活动。

一八九四年，孙中山回到翠亨村家中，给当时在清朝政府里当权的大官僚李鸿章，写了一封表达政见的信——《上李鸿章书》。

在《上李鸿章书》中，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，概括为四句话，叫做“人尽其才，地尽其利，物尽其用，货畅其流”，就是要清朝政府仿行西方资产阶级制度，开办学校，培养人材；设立农官，管理农业，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生产；开矿山、筑铁路、设工厂，采用近代机器生产；实行保护商业的政策，使商人有利可图，努力经营。很明显，他是站在资产阶级

的立场上,希望通过李鸿章这样一类封建大官僚,进行一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。

《上李鸿章书》写好后,孙中山又风尘仆仆地跑到上海和天津,寻找门路,求见李鸿章。李鸿章是一个买办化的封建大官僚,曾用高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机器,开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。他的目的,在于保护地主阶级的统治,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,因此对孙中山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,拒绝接见他。孙中山碰了个大钉子,那份《上李鸿章书》也就石沉大海。

上书失败后,孙中山又跑到北京去探听清朝政府的虚实。那时,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,中国军队在牙山战役中遭到惨败,举国震动。清朝统治者竟然还在歌舞升平,大修颐和园,准备庆祝西太后六十“寿辰”。吃一堑(音欠 qiàn)长一智,孙中山经过这番阅历,认识到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是办不到的,改良主义的道路根本走不通,只能用暴力推翻清朝的统治。至此,他的革命要求大大增长了。他随着南下武汉,观察长江流域的形势,再经过上海去檀香山,筹划经费,集结革命力量,准备武装起义。

孙中山到檀香山后,积极向华侨宣传反清革命的主张,得到一部分进步华侨的赞助。一八九四年十一月,他在华侨中成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——兴中会,最初参加的只有二十多人,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。

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,卖国贼李鸿章又代表清朝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割地的《马关条约》,国内人心

激愤。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，从檀香山回到香港，组成香港兴中会，决定举行武装起义，夺取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。香港兴中会和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的宗旨大致相同，即所谓振兴中华，挽救危局，斗争目标不明确。但香港兴中会的会员入会誓词中，已经标出：“驱除鞑虏（指清朝皇族），恢复中华，创立合众政府。”这代表了孙中山的早期革命纲领，也是他民族、民权思想的初步表现。

香港兴中会的公开机构叫做“乾亨行”，表面上做买卖，实际上是领导广州起义的总机关。经过几个月的活动，孙中山又设“农学会”于广州，借行医和提倡农业的名义，在政、学各界以及清军、绿林、会党中活动。半年以后，他们能够调动的人员，已经数以万计了。为了掩盖清朝官吏的耳目，孙中山利用广州人民重阳（旧历九月九日）扫墓的风俗，通令各路起义人员，一律装扮成扫墓人，于重阳前一天到达指定地点集中。香港方面运送的枪械、弹药，以及三千多起义人员，也乘前一天夜船于重阳清晨登岸，会齐各路大军，向省城广州进攻。但一切就绪之后，却不见香港来人的影子。等到八点多钟，才收到负责香港方面工作的杨衢（音渠 qú）云的电报，说香港方面的起义人员需推迟两天才能到达。原来杨衢云为了与孙中山争领导权，擅自改动战斗部署，起义计划全被打乱。这样，孙中山只好命令已经集中的人员马上解散，并发电制止香港队伍前来广州。第二天，两广总督得到兴中会的叛徒告密，派兵捕去陆皓东等人。杨衢云接到电报时，派来广州的二百人已经下船，船一靠岸就被捕去四十多人。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，

没有正式爆发就被镇压了，但它作为辛亥革命的先声，还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。

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清朝政府悬赏缉拿革命党人。领导起义的孙中山、陈少白等，被迫逃亡日本，设兴中会分会于日本横滨。后来陈少白继续留居日本，孙中山转赴檀香山、美国、英国等地，向华侨宣传革命。一八九六年十月，孙中山到了英国，第二年七月又转回日本，就近策划中国的革命。

孙中山这次在欧洲逗留的时间不算太长，但对他思想的影响却是很大。他在这期间，研究欧、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时期的代表著作，考察它们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。经过研究和考察，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也不完善，它们的政权掌握在少数豪富手中，贫富悬殊的事实，引起长期的社会动荡和不安。为了避免他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后会被打倒，他幻想预防这种资本主义的恶性膨胀，在衰朽的资本主义世界里，保持一块兴盛的绿洲。后来他所以提出“平均地权”、再后又提出“节制资本”等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，就是企图为资本主义弥补漏洞。

一九〇〇年六月，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全面展开，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武装干涉也已开始。孙中山认为武装暴动的机会又来了，就亲自率领一批兴中会会员到香港部署起义。船到香港，香港殖民政府不许登岸，孙中山就在船上召开会议，决定以广东省新安县绿林和嘉应州三合会为主力，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置的军械，在惠州三洲田起义。然后沿海东进，直趋厦门。孙中山说，他和日本台湾总督已有成约，起义

军到达厦门，日本政府即以武器相助。孙中山打算等起义军打到厦门时，自己就从台湾内渡，亲自到军中指挥，用日本运来的军火武装起义军，回攻广州，得手后马上组织临时政府。

十月，兴中会会员郑士良受孙中山委托，率领三合会的人员六百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，几次打败来攻的清军，十多天时间内，发展到两万多人，声势浩大，清军无可奈何。孙中山在台湾得到起义军的捷报，就电请日本人宫崎（音奇 qí）寅藏，将借自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运送惠州。不料这批军械尽是些废铜烂铁，全不能用。在这关键时刻，日本政府禁止对中国革命党人供给武器，又不许革命党人在台湾活动。孙中山一筹莫展，只得派人将这情况告诉郑士良。起义军血战半个多月，虽然士气旺盛，但弹药已尽，正在盼望军火，接到这个通知，非常泄气，全军两万多人，很快就瓦解了。郑士良率领一部分亲随逃回香港。

惠州起义前，孙中山曾派史坚如去广州策划响应，没有成功。史坚如决定炸死两广总督德寿，又因炸药效力不足，没有成功，自己反被逮捕杀害。至此，第二次起义又告失败。孙中山引导起义人员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上，忽视了中国其他起义群众的配合，更不能深入地发动群众作为自己的后盾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。